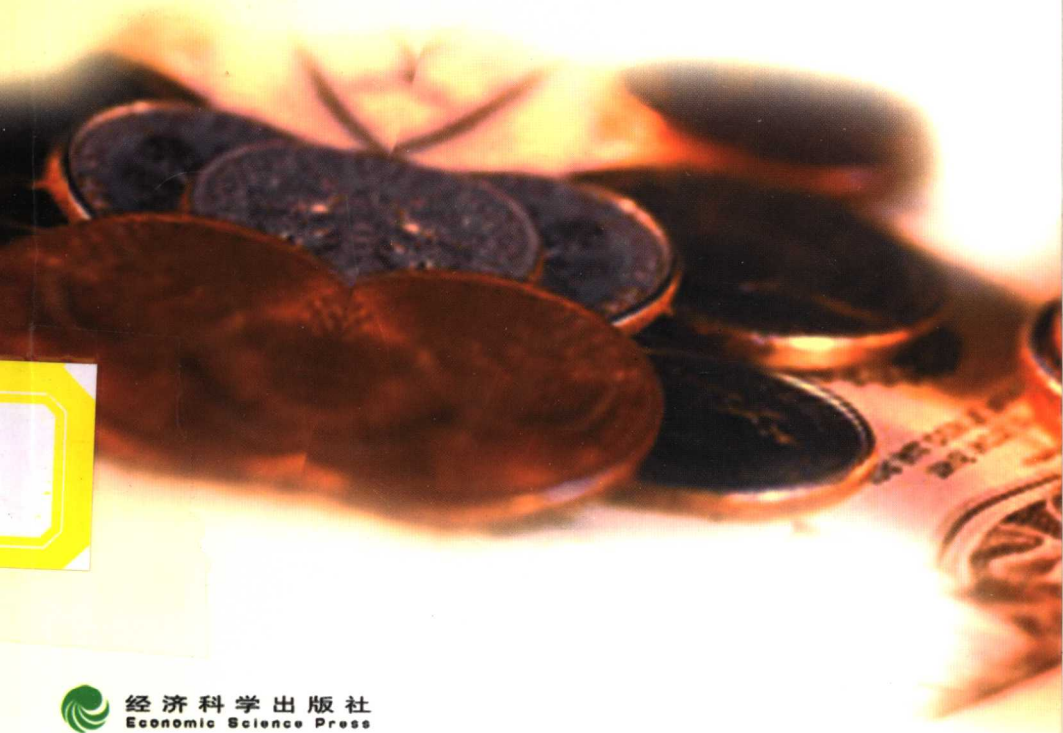


陈岩 著

亚元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7-823.0
/

陈岩 著

亚元

YAYUAN YAYUAN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元/陈岩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58 - 6713 - 0

I. 亚… II. 陈… III. 货币政策 - 研究 - 亚洲
IV. F8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4755 号

致 谢

感谢徐金发先生、杜厚文先生、高成兴先生、薛敬孝先生、熊性美先生、佟家栋先生、钟昌标先生、冼国明先生、陈漓高先生、胡青先生、罗肇鸿先生、金良顺先生、吕萍女士、谭伟先生、刘进社先生、盛松成先生、宋国祥先生、李思毅先生、盛亚峰先生、杨胜刚先生、张斌先生、陈雨露先生、张明先生、钟伟先生、何帆先生、杨柳女士、刘巧云女士、吕建慧先生、李耀先生、Rashad 先生、Bergsten 先生等的培育、启示和帮助，感谢知识前辈，感谢宁波大学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感谢我家人的支持。

前 言

如果现在采取亚元作为记账单位，你用不用？

如果现在推出亚元，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会不会涨？

亚洲现在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过去 10 年，发达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为 2.8%，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则达到 4.3%，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增速均快于世界经济总量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幅度。根据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亚洲国家的 GDP 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已由 1990 年的 15% 提高到 2003 年的 23.8%。若按目前速度发展，亚洲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占据世界经济 30% ~ 50%。

亚洲正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坚力量。区域内贸易的高速发展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而区域内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及极为活跃的外来资本是亚洲区域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在区域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亚洲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亦得到不断提升，1990 ~ 2003 年期间，亚洲经济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从 23.8% 上升到 29.4%。

我们的亚元行动方案是基于对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评估基础上作出的，方案的宗旨是获取亚洲共同货币的福利和力量，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提高亚洲整体的世界地位。原则是负责、战略、共赢、稳步而积极地推进。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由东盟 10 + 3 在东亚高峰会议等形式下提出亚元的行动方案，中国、日本和韩国应给予积极支持和推动。

第二，在 2010 ~ 2015 年成立亚洲中央银行或先成立亚洲货币局，先经营和协调亚洲中央银行的货币交换等，实行作为记账功能

的亚元，后推出后逐渐按货币功能的演进顺序和亚洲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反应，推出接近全功能的亚元。这里亚洲开发银行能否成为或改造为这里的亚洲中央银行是值得考虑和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在 2015 ~ 2020 年在可以执行稳定货币政策的亚洲中央银行管理下，逐步实现货币功能完全的统一的亚元，取消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

值得指出的是，从亚洲共同货币的福利静态看接近亚洲收入的 7%，动态收益和战略收益还要多，有助于亚洲未来收入接近世界收入的 36% ~ 50%。这里的时间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我们这里没有考虑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而是直接考虑设立亚洲中央银行，这是由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确实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重合的地方，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这样的，更何况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未来来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也是短期的，而货币互换功能可以先通过功能逐步完善的亚洲中央银行来完成。另外，美国也没有很好的理由反对亚洲设立亚洲中央银行，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已经设立。我们这里不提倡亚种货币单位加上亚洲盯住汇率体系的格式，因为欧洲的实践证明，那是一段弯路，并且最后以危机而结束了欧洲盯住汇率体系的命运。这样可以减少设立亚元的成本。在这里我们也规避了日元区或人民币区或华元区的问题，亚元是亚洲整体的，不是亚洲哪个成员国家或地区的。是由优秀的亚洲公民专家团队来管理的。在这里我们选择东盟来提议，是考虑到一体化中的权力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一定由东盟来提议，其他机构或者亚洲的公民也可以提议。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已经给出了提议。

亚洲需要的是亚元行动!!

目 录

第一部分 亚洲货币一体化理论

第一章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决定理论	3
一、作为一个系统的亚洲	3
二、不完全货币一体化理论分析	18
三、完全货币一体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34
四、共同货币的“长城”理论与货币重量理论： 反货币危机	41
五、共同货币的交易成本理论	51
六、竞争解的共同货币：货币竞争理论	54
七、国际货币体系变化决定的共同货币	58
八、亚洲共同货币的内生与外生相对决定论：我的观点	61
第二章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理论	62
一、货币一体化的制度理论	62
二、货币一体化的进化理论	64
三、货币联盟的谈判	69
四、货币联盟的权力划分	84
五、货币转化：货币转化率问题与亚元货币篮子的构成	102

第三章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理论	104
一、不完全货币一体化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104
二、完全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106

第二部分 统一货币：欧元的经验

第四章 欧元之父的鉴定与欧元历程	135
一、欧元之父的鉴定	135
二、欧元与欧元的发展历程	138
第五章 欧洲中央银行的运作	143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和职责	143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组织结构	144
三、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	147
四、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机制与货币政策工具	151
五、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156
第六章 欧洲货币联盟的影响、问题与经验	162
一、欧洲货币联盟的影响	162
二、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	164
三、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我的看法	166

第三部分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行动议程

第七章 亚洲经济发展与经济金融合作的进展	171
一、亚洲经济发展的阶段	171

二、亚洲经济合作的进展	173
三、亚洲金融货币合作的进展	174
第八章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行动方案	178
一、对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的评估与判断	178
二、亚元的行动方案	185
三、亚元推进中“10+3”各成员的作用	194
参考文献	198
后记：一种担心	208

第一部分

亚洲货币一体化理论

第一章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决定理论

一、作为一个系统的亚洲

要对亚洲的货币一体化进行研究，我们首先应对亚洲的系统性进行探讨。亚洲是否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

从区域来看，我们看到我们所研究的亚洲在这里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盟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是处于一个相邻的地理位置的东亚地区，因此从区域来看，亚洲可以看作处于一个区域系统。

从文化来看，我们所研究的亚洲总体上属于儒家文化区。东亚各国（地区）的社会文化在历史上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且现在仍属于儒家文化主导的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的社会文化属于典型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这是从孔子时代开始的，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其中有波动的时候，且有一些变化。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从德川时代就受到儒家的强烈影响，后来一直有家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倾向，有节俭、高储蓄的特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引进西方式价值观念，且日本本身神道教的影响也较重，但考虑到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受到强烈冲击，由于许多儒家思想在日本国民中仍有很深的历史沉淀，因此总体上仍可以说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韩国也是一个儒教国家，中国的儒学思想早在公元1世纪后就开始传入韩国，对韩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下半叶西方观念开始进

入韩国,刺激了韩国人个性的发展,使韩国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伦理观发生一些变化,但是韩国儒教的色彩仍比较浓厚,因此,总体上看韩国仍是属于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东盟的文化有一定的多样性,除儒教外,在一些国家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影响,但是勤劳、节俭、注重教育、崇尚权威的儒家文化的特征较强,因此作为一个总体也可以看作是儒教文化区。

从经济上看,世界银行曾将东亚经济概括为“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有:^①

第一,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均在不同时期实行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

出口的迅速增长表现为亚洲占世界出口份额和占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特别是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增加,亚洲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7.9%上升到1980年的13.1%,到1990年则上升为18.2%;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12.2%上升到1980年的21.1%,到1990年则上升为56.3%,这包括日本。其中日本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韩国、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1.5%上升到1990年的6.7%,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6.0%上升到1990年的33.9%;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1.5%上升到1990年的12.4%。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亚洲出口的增长中尤为显著,亚洲制成品出口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9.4%上升到1980年的17.3%,到1990年则上升为21.3%,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14.2%上升到1980年的48.6%,到1990年则上升为73.5%,这里不包括日本。日本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7.8%上升到1990年的11.8%;韩国、中国香港、新

^① 陈岩:《东亚再崛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0页。

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1.5%上升到1990年的7.9%，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13.2%上升到1990年的61.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1965年的0.1%上升到1990年的1.5%，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份额从1965年的1.1%上升到1990年的12.0%。

与出口迅速增长相对应的是亚洲的开放程度（进出口占GDP的比重）的显著增加。从1970年到1988年，中国香港的开放度从1.50增长到2.82，新加坡从2.12增加到3.47，马来西亚从0.89增加到1.09，中国台湾地区从0.53增加到0.90，韩国从0.32增加到0.66，印度尼西亚从0.25增加到0.42，泰国从0.28增加到0.35，就总体而言，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从0.20增加到0.23，撒哈拉以南非洲从0.24增加到0.45相比要高出许多，除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较晚才开始出口努力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具有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的开放度。中国从1978年起也实行了开放改革的政策，积极促进出口，其贸易和开放度都有了惊人的增长，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此外，亚洲的外向指数不仅比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要高，而且比OECD国家的也要高。再者，亚洲是积极地对外国技术开放的。它们鼓励从许可证、资本货物的进口、国外培训、吸引外资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技术水平，甚至有时对外国直接投资严格控制和对国内市场实行保护政策时，亚洲也仍鼓励寻求和吸收外国技术。日本、韩国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的中国台湾，尽管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但它们都积极鼓励通过许可证及其他方式获取国外技术，从而弥补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缺陷。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则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来获得技术。新加坡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置了以寻找合适的外国投资者为主要任务的经济计划机构；马来西亚则特别地注意寻找出口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日本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是对一国技术进步起促进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亚洲出口的增大、开放度的提高和出口商品结构的迅速转变都是和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实施密不可分的。我们看一下亚洲国家和地区贸易政策的演变情况。日本的贸易政策从战后一开始就具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特点，也许将日本的贸易政策概括为“以保护促进出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日本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确立了以贸易立国为主导的对外经济战略，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日本一直对希望发展的行业实行有选择的保护，日本早先所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许多方面是和一些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经济相似，直到60年代末，日本的实际贸易保护率仍相当高，并呈现为多阶段的形式，从保护程度较低的原材料到保护程度较高的消费品，日本与许多进口替代经济不同的是，日本对机械设备（最终生产资料）的保护程度特别高，但在70年代，在机械设备行业的出口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明显的竞争能力后，对这一行业的实际保护率下降了，而对钢铁及有色金属业的高水平保护一直持续到1970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如纸浆、造纸和化工工业的保护程度一直很高，对纺织的保护亦如此，但近些年来“规制缓和”的自由化使其保护程度有所下降。也许正是这种“以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才使得日本战后在纺织品、钢铁、汽车、彩电等方面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国的。

韩国在经过了1950~1960年战争后的重建和进口替代后，进入了1961~1973年的出口导向发展阶段，这时韩国的出口是由对国内进口的保护结合进行的，韩国的决策者控制着贸易、汇率和金融政策及产业政策的决策权，但是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使用这些工具服务于出口这一首要目标。政府通过统一汇率，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允许保留为出口而进口用的外汇、优惠的出口信贷、允许举借外债、直接出口商和间接出口商都享有税收豁免的优惠、进口的中间产品能得到补贴等促进出口。由于出口商有很大的进口管制豁免权，这就避免了因对出口商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行限制而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就是和日本相似，在经济走上出口导向发展轨

道时,仍然对其希望发展的行业进行有选择的保护,这些政策使得韩国的出口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也实现了快速的转变。这时韩国的出口产业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向出口的倾斜性,而不像世界银行(1993)所指出的对出口产业的贸易政策是呈中性的。1973~1979年政府采取税收鼓励、实施具体的工程、有补贴的公共服务和优惠的资金,使资源流向特定的重化工业产业,政府选了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三个部门来满足在工业原料方面的需求,选了造船、电子和机械三个部门,意在使其成为技术密集的出口产业。韩国的重化工业化取得了部分成就,这是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实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并为此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的。但是,重化工业化中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宏观经济的严重不稳定,使得政府在1980年以后开始改变对重化工业严重倾斜的贸易政策,转向自由化政策,为此,政府削减和迅速扭转了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将货币贬值,改变信贷分配政策,取消了对重化工业部门的大规模优惠。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韩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只是相对以前自由化,实际上,到韩国的成功被人们普遍承认的1983年,许多产业仍旧被某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结合的形式所保护着。

中国台湾地区在1949~1952年土改和重建中,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为出口提供了原料并以赚得的外汇进口机械、设备以及工业原料,这时台湾地区是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1953~1957年,台湾地区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台湾当局采取广泛的数量限制和高关税及多重汇率来对岛内市场进行保护,狭岛内消费品免受国外产品的竞争,同时台湾当局对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实行补贴,并且在美国的援助下,对基础设施大量投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口替代的成本越来越大,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岛内市场已饱和,这时的贸易逆差由于被美国的援助弥补,而使国际收支平衡,又由于预见到美援将终止,这些使得台湾当局从1958年转向出口鼓励的政策,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和吸引国外投资的措施:以单一汇率取代了多重汇率,并避免

了台币的升值，特别针对用以出口的进口投入，降低了关税和进口控制，并向出口商提供低息贷款。这一出口鼓励阶段持续到 1972 年，在此期间，外国投资取代美国的援助，成为主要的外资来源，它在促进工艺和技术的交流以及各产业的产品质量提高和品种多样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鼓励是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中最重要的政策变更。1973 ~ 1980 年出口导向的产业取向向资本密集和重化工业转化，同时台湾当局对公路、铁路、机场以及核电站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台湾地区，一方面重化工业化受阻，另一方面面临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增大，比台湾工资更低的新兴工业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台湾又将经济的重心转向信息、生物工程、电子和光纤、机械和精密仪器及环保技术产业，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全面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战略，包括取消外汇管制。值得指出的是，在台湾地区实行出口鼓励的贸易政策时，直到 1972 年，仍有很大一部分产品要受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2/3 的潜在进口商品要交纳税率高于 30% 的普通关税，直到 1980 年，仍有 40% 以上的进口产品要交纳高于 31% 的一般性保护关税。另外，汇率政策以及使之得以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是整个出口鼓励政策的组成部分。

马来西亚在 1950 ~ 1970 年间，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但是马来西亚进口替代的有效保护水平很低，其平均水平只有 7%，远低于经济水平与其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 25% ~ 92%，并且政府不偏重发展哪个部门。1971 ~ 1985 年，马来西亚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出口鼓励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政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出口鼓励补充 60 ~ 70 年代延续下来的温和的进口替代政策的不足。出口鼓励政策主要包括出口收入及其国内投入的税收减免、出口促销支出的税收减免以及允许出口占其产量 20% 的企业进行加速折旧，以信贷担保及对出口低息融资自动贴现来鼓励出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以及获准免税进口原料进行组装和加工后再出口的制成品保税区是使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成功结合的关键，这一时期，政府积极